評介布林頓的「革命之剖析」

——兼評兩種中譯本

• 吳乃德

一、書評

廿世紀乃是人類歷史上充滿最多暴力的時期之一。從本世紀初以來，革命、內戰、暴動、政治謀殺、叛機等暴力事件層出不窮。根據美國政治學者 Ted R. Gurr 在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 Strife*" 一文中的統計，由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八這八年之中，全世界一百二十一個較大的國家與地區中，有一百四十一個曾發生政治暴力事件。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以暴力推翻政府的例子遠比經由選舉的和平轉移爲多。暴力似乎是本世紀政治過程的基調。

此項影響政治過程既深且鉅的重大問題自然引起各種不同學科學者之關切與興趣。歷史學者、社會學者、人類學者、心理學者與政治學者都曾對它做過深入的探討。（很遺憾的，政治學者對此項重大的政治問題加以探討，還是最近十年間的事。）於歷史學者的研究中，用力最深、成果最豐碩的也許是布林頓（Crane Brinton）。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第一版於一九三八年出版，其後再版多次。在本書中，布林頓以其豐富的歷史知識，復以英、美、法、俄四個革命爲研究對象，將這四個改變人類歷史的革命，做了一番廣

泛而深入之剖析。歷來有關革命之歷史著作並不算少——據筆者粗略的統計，較重要的約有八十部——然而以此種比較研究法來探討革命的，這也許是繼法國學人 Tocqueville 之後的第一部。

布林頓在分析這四個革命之後，發現它們在許多方面都有雷同之處。由革命前舊社會之政經社情況、革命份子之類型、溫和派之統治、極端份子之得勢，以及接踵而來的反革命。在這個革命之循環過程中，此四個社會都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例如在經濟方面，這四個政府在革命之前，都發生嚴重的財政困難。它們解決此項困難的方法都是增加賦稅。而人民却拒絕給予。「這四個革命都自人民反對稅收開始。他們組織起來反對這項措施，最後竟激動得要推翻並取代現存的政府。」（八十五頁）然而，財政困難僅屬於政府。社會一般而言是非常富裕的。這四個社會在革命之前不僅未曾遭遇飢饉或匱乏，相反的，它們正處於空前未有的經濟好景之中。這四個國家的人民之所以反對他們的政府，乃因他們覺得他們無限美好的前途遭到腐敗舊政權之阻撓。這些革命份子的心理狀態並非悲觀、忿怒、受迫於飢餓；相反的，他們樂觀、進取、雄心萬丈。此爲這四個革命與充滿中國歷史的農民暴動之最大不同處。

「總括來說，如果我們檢視這些社會於革命前數年之經濟情況，我們會發現，第一，它們就整體而言是頗爲繁榮的；第二，它們的政府財政拮據，超過一般程度；第三，某些團體感覺政府的政策違背其經濟利益；第四，除俄國之外，於宣傳中並未公開提及，階級的經濟利益乃是推翻現存政治與社會秩序之動機。」（頁三七——八）

表現於政治上之共通對象則是政府之無能、知識份子之叛離、統治階層之叛變、與階級之對立。如果這四個政府都有魄力、能當機立斷，對革命份子採取嚴格之壓制，那麼這些革命也許都不會發生，或至少會延遲幾年。當時的沙皇如果換了拿破崙，俄國革命也許就不會發生了。以當時的俄國來講，情形確實如此。可是並非在一切情況下，嚴密的控制都能消弭革命。壓制能否有效仍須仰賴革命團體之實力、客觀之政治社會情況與國際關係諸項變數。

第二個共通現象是知識份子與統治階層之叛離。任何一個社會中，知識份子永遠是不滿現實的。但是

這幾個社會裏，對政府不滿、攻擊及至意欲推翻的知識份子所佔比例之大——甚至及於統治階層內部，實令人驚異。可惜布林頓不曾深入地探討知識份子在革命中所發揮的功能。我們幾乎可以斷言，知識份子在任何革命運動中，都是具有決定性的角色。即在中國歷史數不清的農民暴動與革命中，領袖人物若非知識份子就是以知識份子爲幕僚班底。知識份子在革命中的決定性影響力最容易由朱元璋的革命運動中看出。

這四個社會裏革命份子之典型，他們的經濟與社會背景、他們的性格特徵都表現出某種程度的一致性。他們大部份都來自中上階層，年齡都在四十歲左右。較狂熱於革命者大多是一些自認爲生不逢辰，有志未伸的人。是否他們個人生活之挫折導致他們的政治作爲，布林頓未曾有片言隻字提及。政治學界中，對此持肯定看法的不乏其人。美國政治學大師 Harold Lasswell 也許是首先提出此項理論的人。他所寫的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出版於一九三〇年，布林頓的書出版於一九三八年。布林頓是否受他影響，我們不得而知。他雖未曾再深入加以探討，不過一個歷史學者能注意及此，確屬難能可貴。

可是我們却不能據此而宣稱，以上所述諸現象乃是所有革命所共有的，或甚至以這些現象來預測革命之即將發生。我們也不能認爲，布林頓所提出來的政權循環過程——由舊政府到溫和派，再由溫和派到極端派，終出現反革命——乃是一成不變的，是任何革命所不可避免的結果。至少開發中國家的革命與中國古代的農民革命就不曾出現此種循環模式。這點是讀者必須牢記於心的。

布林頓所列舉的這些現象能否「解釋」革命的起因是有問題的。事實上，他寫作本書的目的也不在「解釋」革命爲何發生。他只是將四個革命共有的現象收集排列在一起。藉著此種比較研究法，讀者能對革命何以發生獲得一些啓示，但絕不能將這些現象當做革命必然發生之證據。在這些現象與革命之間，我們找不到必然的因果關係。這些現象做爲革命的「徵候」尚可，做爲「起因」，則尚差一大段距離。在原因與結果之間，我們需要一個理論架構將兩者邏輯地、科學地連繫起來。舉例來說，我們若要解釋天爲何下雨，我們單單描述烏雲密佈、空氣潮濕悶熱等現象是不够的。我們仍需要一個或多個理論來連繫這些現象

與下雨之間的關係。比如水在正常氣溫下會逐漸蒸發（一個通則）；水蒸氣的比重比空氣輕，所以會上昇（另一個通則）；水蒸氣遇到低溫會凝結爲水（又一個通則），而高空之氣溫是極低的（一個事實陳述）……。如此將幾個通則或理論串聯起來。形成一個新的通則或理論，才能眞正的解釋某件事的因果關係。否則僅是「描述」而已，並不能算是「解釋」。布林頓這本書就缺少此種理論架構。

然而，布林頓畢竟並非政治學者。身爲一個歷史學者，他沒有義務提出一個解釋因果關係的理論架構。以一個歷史學者而有這樣的成績實屬不易。他由四個革命中歸納出來的共通現象，對讀者而言是一個很大的啓示。而對有志研究革命的政治學者而言，則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其廣博的歷史知識更爲政治學者提供了豐富的歷史材料。無怪乎美國政治學者 James C. Davies 在其所編的 *When Men Revolt—and Why* 一書的扉頁中，要寫上：「謹將此書獻給克連•布林頓」。

本書有兩種中譯本。一是張尙德先生所譯，書名爲「革命的剖析」，由帕米爾書店於五十六年出版。另一爲賀同先生譯的「革命解析」，黎明文化服務中心出版，出版年月不詳。

黎明書局的版本，排版錯誤頗多，從第一頁至二十頁，附錄的英文字一共是三十八個，竟有十九個是錯誤的。

賀同先生的翻譯實過於草率。好幾個專門術語都譯錯。如 case method（個案研究法）譯爲「個案法則」（譯本頁一五），conceptional scheme（觀念架構）譯爲「思想體系」（頁十一），body politics（政治有機體）譯爲「政治團體」（頁二一）。

另外有許多專有名詞不但不依其本國語言音譯（這項失誤張尙德先生亦不能免），一些非常響亮的名字也不依一般都熟悉的譯法，而胡譯一通。如傅利葉（Fourier）譯成「傅萊爾」，史賓格勒（Spengler）譯成「斯賓戈勒爾」；湯恩比（Toynbee）譯成「陶恩比」；英國小說家喬叟（Chaucer）譯成「邱賽爾」（張尙德則譯爲「喬賽爾」）；英國紡織工業城蘭開夏（Lancashire）譯成「蘭凱希爾」；亞

11、譯評

當史密斯（Adam Smith）譯成「亞當斯米司」，洛克（Locke）譯成「陸克」，孟德斯鳩（Montesquieu）譯成「蒙德斯戈」，卡萊爾（Carlyle）譯成「卡爾萊里斯」，甚至連伏爾泰（Voltaire）都譯成「沃戴勒」，實在不可思議。

英國政治哲學家 Harrington 的烏托邦名著 Oceana，兩位譯者都譯成「阿細娜」，原書名是 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Oceana 是大西洋中一假想國。即使譯者所學非政治，百科全書中總是可以查到的。

第二章首句From France, which has long carried out a kind of linguistic Free Trade, comes the phrase "old regime." 賀同先生譯爲「舊制度一詞是由許久以來便以自由貿易爲標榜的法國傳過來的。」可見英文程度實在有問題。第四章標題與首段中，revolutionist 共出現四次。四次都譯成「革命」。顯然不是排版的錯誤。

至於第四章第二節第二段，原文爲 "Here again we must not postulate for the normal society with which we contrast our prerevolutionary societies, a lying down together of the lion and the lamb. Perhaps, indeed, we should postulate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ivileged, upper, or ruling class and the rest of the people that Toynbee calls "mimesis", a sharing of ideals, a looking up from the lower to the higher groups ....." 賀先生竟譯成「此外，我們雖然認爲革命前的社會，是充滿了反對與不安的因素的，但我們也不能假定我們的正常社會，是以得到大衆的贊同的。在此我們所要探索者，乃是介乎特權階級，或上層階級，或統治階級與其他的一般平民之間的關係。我們要由低階層一般民衆的處境，向上觀察那些處於高階層的人們。」這顯然不是翻譯而是作文了。不知譯者靈感由何而來。

張尙德先生的譯本雖然也有若干瑕疵，但是與賀先生的譯本比較起來，可讀性高多了。若要一一指出張先生的小錯誤，那我就顯得過於吹毛求疵了。張先生的譯文遠較流暢，也較忠於原文。不像賀先生的譯文，譯者自說自話，加油添醬的例子到處可見，偶而

甚至有驚人之筆出現。

最後，我們順便談談目前翻譯出版界的共同毛病。據筆者所知，很少有出版社在中譯本附上原書的出版資料的，若有，大都殘缺不全。有些書甚至連原書名、原作者姓名都遺漏了。此外如原書的出版年代，出版公司等，這些對讀者而言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搞文化事業的人，應該多用點心才好。

姚一葦著

文學論集

平七〇元，精一〇〇元

殷允芃著

新起的一代

每册45元

梁實秋
林海音等著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

小說平　九〇元　精一二〇元
散文平一二〇元　精一五〇元

林柏燕著

文學探索

每册35元

周　寧著

橄欖樹

每册35元

以上五書均由
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